

杨富学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中國北方 民族歷史文化

● 论稿 ●



K28

K289
51

51

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

杨富学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杨富学著.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1

ISBN 7 - 226 - 02483 - 7

I. 中... II. 杨... III. 古代民族—民族历史—研究—中国 IV. 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7302 号

责任编辑:李 果

封面题签:黄心川

封面设计:白 牛

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

杨富学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甘肃乌金煤田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5 字数 314 千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 - 226 - 02483 - 7/K · 425 定价:28.00 元

序

一

自古以来,我国北方就居住着许多民族,影响较大的有匈奴、月氏、乌孙、东胡、丁零、氐、羌、鲜卑、乌桓、柔然、高句丽、突厥、回纥、吐蕃、哈刺鲁、粟特、党项、靺鞨、渤海、契丹、女真、鞑靼、蒙古及汉等。这些民族此起彼伏,互相交融,与此同时又不断分化,流入其他地区,与其他民族融合,形成一系列新的民族。其中大量人口涌进中原,融入汉族之中。而汉族及其先民也不断徙往漠北、西域等民族地区,加入少数民族的行列。长此以往,北方各族间于是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无法割舍的关系,成为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是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北方民族史对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同时,北方一些民族如匈奴、突厥、蒙古的马蹄踏遍了欧亚大陆,纵横数万里,大大影响了欧亚大陆各国各族的历史进程,他们虽对欧亚许多国家、民族的经济文化起过严重的破坏作用,但同时也扮演了促进欧亚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因此,可以说,对北方民族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一个世界性课题,是国际学术界研究世界历史进程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因此,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北方民族史的研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我国学者如马长寿、冯承钧、岑仲勉、冯家昇、韩儒林、札奇斯钦、刘义棠、蔡美彪、陈述、林干、周清澍、白滨、苏北海、杨建新、周伟洲、孟广耀、薛宗正等都有重要论著问世,为北方民族史研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许多学者的研究大都偏重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研究,对北方民族文化的研究涉及较少。同时,卢明辉

等人对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也偏重于各族间政治、经济、军事关系的研究,对北方各族的文化交流的影响,也较少论及。清格尔泰、亦邻真、耿世民、王尧、史金波、李范文、刘凤翥等对北方民族文化研究较多,但作为语言学研究者,其研究重点在于文献的解读与语言学探讨,而非文化史。

近年,张碧波等人致力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的研究,出版了两巨册《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其一为专题文化卷,其二为民族文化卷,二者互为表里,对北方民族史的研究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但该书论述的仅是北方各族自身的文化,对各族间文化的相互交流、影响、融合却少有论述。而要真正认识北方各族的文化,离开了北方各族文化相互间的交流及北方各族与中原民族的交流,是很难认识清楚的。更进一步说,要想清楚认识北方民族的完整历史,离开了北方民族的文化,同样也只能是一种空想。所以说,研究北方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是我们研究北方民族史的迫切课题。

这里,我们必须面临这样的现实,即我国古代史书尽管浩如烟海,但对北方民族文化交流过程的记载却相当贫乏,支离破碎,甚至许多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往往根本不见记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研究就只能从各民族文化中揭示其他民族的文化影响入手。但要确定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哪些是该民族固有的,哪些是受其他民族的影响而形成的,非为易事。有些民族的文化彼此相同或相近,但却并非由于相互影响而形成,而是由于这些民族处于相同的地理环境,或有相同的经济类型,相同的生产发展水平才产生了一定的文化共性。而历史文献往往仅记载某一民族某一时期的文化是什么样的,并未告诉我们哪些文化是该民族固有的,哪些是新引入的。这就只能从比较着手,一方面比较一种民族文化的前后变化,搞清其演变过程中固有的是哪些,而哪些又是随着自身的发展而新产生的,以及哪些是从其他民族那里引入的;同时还要

比较许多民族文化的内核,以确定其异同。这种纵横捭阖、上下左右的文化比较研究,若没有广阔的知识基础和综合研究的能力是无从下手的。这是我国相关研究长期比较薄弱的主要原因。

近年,常在书刊上读到杨富学同志研究北方民族文化交流的论著,如《契丹族源传说借自回鹘论》、《也谈 Sarix Baš 的名与义》、《回鹘佛教对北方诸族的影响》、《从二十八宿看唐宋时代吐鲁番的文化杂糅》、《回鹘文献所见蒙古“合罕”称号之使用范围》、《“黑龙江”名出阿尔泰语考》、《汉传佛教对回鹘的影响》、《敦煌西域出土回鹘文献所载 qunbu 与汉文文书所见官布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见吐蕃回鹘文化关系》等,常为其见解的独到和资料的新颖所吸引,进而得到启迪,感到振奋,恰如郁闷中被注入一袭袭新鲜的空气。

为免学术界同仁搜检之苦,同时也对昔日的研究作一小结,杨富学同志将已发表或最近新撰写的除专门论述回鹘历史文化者外研究其他北方民族的论文结集出版。此举嘉惠学林,我以杨君未曾谋面的忘年交身份,成了该书的第一位读者。拜读大作后,我进一步感受到杨君对北方民族历史文化问题研究的众多独到之处。他以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为基础,同时致力于各民族间文化交流的探讨,这是一条非常正确的学术之路。只是这条道路崎岖太多而满布荆棘,故同行者少,前方缺乏路标,困难多多。值得钦佩的是杨君不为这些困难所惧,像一个独行客,寻觅着,探索着,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努力进取,终于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成功之路,并通过在这条路上的艰难跋涉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这里还要提到一点,长期以来民族史家都苦于文献资料中对北方民族记载的贫乏。汉文史书尽管汗牛充栋,但给我们留下的民族史资料却少得可怜,而且既零碎又分散,有时往往仅有只言片语,难究其详。这一状况严重地影响了北方民族史研究的进展。随着考古资料的增多和考古学的发展,以及少数民族古文字资料

的进一步发现与释读,许多学者都将目光投向考古资料,投向少数民族古语言文献资料,冀求通过这些新涌现出来的资料来补史、证史,并开拓新的学术领域。但一个学者要兼通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同时又兼通古代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资料,是非常困难的。从杨富学同志的论著看,他兼备研究北方古代民族历史文化的多种优势和学术素养,不仅对古代汉文文献及各种考古资料有较好的把握,而且兼通古突厥—回鹘语文与梵文,并有熟练阅读、运用英语、德语研究著作的能力。他成功地将这些优势运用到研究中去,而没有很多学者在研究中常常顾此失彼的尴尬,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本书所收论文有许多都显示了杨富学同志在广阔知识基础上对各民族历史文化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比较研究的能力。虽然这一工作还仅仅是开始,但已表明杨富学同志治学的道路是正确的,他的知识基础和研究能力是适合于走这条道路的,在这条道路他必定能取得卓越的成就。他的这种研究方法也是富有借鉴意义的。我殷切期望富学同志在这本书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自己的研究领域,最终完成一部比较研究中国北方民族文化史的专著或一部中国北方民族文化交流史,填补这方面的空白,攻克学术上的顽固堡垒。

孙进己

2001年3月15日

序 二

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在中华历史文化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历史文化作为中华文化区系中的草原游牧文化而为学术界所关注。杨富学先生的《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以下简称《论稿》),就是作者关于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文的选编,是其多年研究精华的结集。

中华大地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地理文化单元,从而形成了中华大地上的多元文化区系,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多元性、本土性与兼容性诸特点。北方区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毋庸赘述,如同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样,北方区域文化也是多元的,并按多元辩证发展的规律向前发展,也呈现为多元一体的特点。《论稿》选编的四组文章中第一组重点论述了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的交互影响问题。《龙:联结中华诸族与中印文化关系的纽带》是一篇讨论中华诸族龙文化及其与印度龙之间相互关系的论文,观点独到而探讨深刻。河南濮阳西水坡的蚌龙被称为“中华第一龙”,此外,比较重要的古龙文化遗迹尚有辽宁阜新查海的龙形堆塑,内蒙古翁牛特旗的大型玉勾龙,辽宁凌源、建平的五猪龙,湖北黄梅的石塑龙,河南偃师二里头的螭龙图案,山西襄汾陶寺的彩绘龙纹陶盘,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的龙首人玉饰等等。论者指出河南濮阳蚌龙是“中华后世龙造型的鼻祖”,“早在炎黄时代以前,东北地区的先民与中原地区的先民一样,都有过崇拜龙的信仰,显示出中华民族各地文化差异性与一致性共存”。论者考察了诸夏龙文化向周邻的辐射,认为华夏龙

文化“对中华各族龙崇拜意识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该文饶有兴味的是对“中国龙与印度龙的关系”的论述，实是一篇中印古文化交流史，指出“它也是联系中国与南亚，尤其是与印度之间宗教文化关系的一条纽带”。

《也谈 SARIȜ BAŠ 的名与义》是作者研究裕固族族源问题的新尝试。裕固族来源于历史上的“黄头回纥”。至于“黄头”的含义，学术界研究者众多，但一直未能形成令人信服的结论。论者根据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木片文书中出现的 SariȜ Baš 一词，结合古代西北历史上出现的“黄姓突骑施”、“黄头鞑靼”以及东北地区的“黄头室韦”、“黄头女真”，尤其黄头室韦曾以黄头发向唐朝朝贡一事所体现的“黄头室韦人对自己头发的珍重”，指出，“除了北方民族尚黄这一因素外，说不定此‘黄头’还真有‘黄头发’之意呢”！言之成理，而又让人觉得耳目一新。

《“黑龙江”名出阿尔泰语考》是一位西北地区学者从语言学以及方位学、颜色（色彩）学等角度探讨东北学术问题，以揭示“黑龙江”其名的新尝试。文中通过突厥语、汉语、蒙古语、契丹语、达斡尔语等诸多语言对黑龙江称谓的比较研究，得出：“黑龙江之称并非源自汉语，而是当地阿尔泰语系民族固有之称”的结论。这是一个新发现，一个创建，也是西北古文化与东北古文化交流的结晶。

《从二十八宿看唐宋时代吐鲁番之文化杂糅》一文从文化史的视觉考察了古代天文学在吐鲁番地区的发生、发展，指出这里既有中原文化的影响，也有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的影响以及中印文化的交互影响，更有吐鲁番人自己的创造。作者指出：“吐鲁番二十八宿壁画、写本的发现，丰富了我国天文学的内容，通过它，可以从一个侧面清楚地看到吐鲁番古代文明的多样性。”指出吐鲁番人（9～14 世纪）“以容纳百川之气概，借鉴中原、印度、波斯、阿拉伯文化之优秀成果，以充实、发展自己的民族

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多元性与兼容性的考察，读来令人振奋，令人信服。

《回鹘文献所见蒙古“合罕”称号之使用范围》是一篇短文，但很有启发性。如所周知，敦煌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回鹘文文献很多，但这些文献大都是用十二生肖来纪年的，故难以确定其具体年份，给学术界的研究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如何为文献定年，成为回鹘文文献研究中首要的任务之一。本文利用吐鲁番出土回鹘文《七星经》中出现的 *kui šipqan-liy ud yil*（十干之癸牛年）、*Qayan Qan*（合罕皇帝）及皇子 *Kušala*（和世珠）、*Sitibal-a*（硕德八剌）等可供确定年代的文字，将其推定在 1313 年。于是，便可有把握地将文献中的 *qayan qan*（合罕皇帝）确定为元仁宗（1311~1320 年在位）。又结合汉文文献中忽必烈汗曾被称作“合罕皇帝”的例证，否认了学术界长期流行的“合罕/合罕皇帝”这一称号专用于指称窝阔台汗的传统说法。使人不难从中领悟到语言文字学与历史学研究相结合的重要性。

考古学界早已认识到东北地区与西北地区自远古以来就存在着双向文化交流。著名东北考古专家苏秉琦先生指出：“我曾经设想：在古代北方与中原之间，可能存在一条呈‘S’形的通道，‘S’形的上弯是大凌河、桑干河，中经汾河，下弯是黄河、渭河（也包括伊、洛河）……终于在蔚县西发现红山诸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因素——鳞纹彩陶罐、‘之’字纹筒形罐与玫瑰花彩陶盆共生，证明红山诸文化与仰韶文化在这里会合了……这就使中原的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之间联成一条西南——东北向的通道，使典型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这种彩陶图案到达北方。”（苏秉琦《关于编写田野考古发掘报告问题》，《辽海文物学刊》1987 年第 1 期）他还认为：“继距今五六千年间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会合迸发出文明火花之后，距今四五千年间在内蒙古河套、山西汾水流域也出现了以文化融合为形式的文明火花，最终

连贯一气……”（苏秉琦《象征中华的辽宁重大文化史迹》，《辽宁重大文化史迹》前言，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美籍华裔文化人类学者张光直教授在阐述中华文明史的形成时指出：“中国相互作用圈”的命题：“其一，所有的区域文化在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都更广泛地分布，而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趋于深化，终于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其二，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第151页）东西文化交流通道也好，相互作用圈也好，都是称中华文化区域文化之间存在的“连锁关系”——文化交流关系。在《论稿》中已有多篇论文阐述了这个问题。《回鹘佛教对北方诸族的影响》一文，通过对回鹘佛教历史的系统考察，指出“回鹘文明的许多方面，如文学艺术、哲学思想、天文历法、语言文字等都深深地打上了佛教的烙印”，当时的回鹘地区已“成为当时中国西北地区佛教文明的一大中心”，不仅如此，“回鹘人还在与北方诸族（如党项、契丹、女真、蒙古）持续不断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又以不同的方式把自己的宗教输入到这些民族之中，程度不同地对这些民族的佛教产生着影响”，并“同时也影响着西域察合台汗国王室的文化习俗”。最后，作者又重重地点出一笔：“这是中国北方佛教发展史中值得注意的一页。”而这恰恰是过去学术界未引起足够重视的，甚至完全忽视的内容。在关于契丹—辽朝历史文化的一组论文中，在论析辽朝的西域经略、契丹族的婚俗文化之外，有两篇最需关注。

其一为《辽鎏金双龙银冠之佛学旨趣——兼论辽与敦煌之历史文化关系》。作者指出辽宁建平县张家营子契丹贵族墓中出土的鎏金双龙银冠根本不是学术界过去所认定的“佛门之冠”，而

是一种贵族之冠，而且，还不是一般的贵族，其身份应是契丹皇族显贵人物。作者结合辽代的碑铭文献，认为辽朝统治者是以转轮王自居的，故佩带具有明显护法标志的冠帽。其图案造型与甘肃敦煌莫高窟北魏 285 窟南顶的一幅壁画不无相同之处。该壁画中心为一典型的置于开敷莲花之上的摩尼宝珠，两侧有二飞天相对护持，其主题构图与辽冠如出一辙。在同窟东顶亦有一图，中心也是摩尼宝珠，但两侧的护持已不再是飞天，改成了伏羲与女娲。通过比较不难看出，辽冠之二龙护珠造型与敦煌艺术中的二飞天或伏羲女娲护珠造型之间的密切关系。作者进一步指出，由于辽朝开拓西疆，使辽与敦煌的亲善关系得到发展，辽朝的佛教典籍及其文化艺术传入敦煌诸地，在莫高窟中不仅有辽朝佛经出土，甚至“在敦煌莫高窟五代时期的壁画中，可以见到契丹人的画像”。在河北易县辽代佛教艺术中心的八佛洼最早出现八罗汉造型，与之同时，敦煌也出现了八罗汉群像，可见于沙州回鹘时期的安西榆林窟第 39 窟中。对这一文化现象，作者指出：“这些艺术品在风格上都属于创新，且同时发生在中国的东北和西北”，回鹘佛教文化从中起到了纽带作用。《论稿》用文化比较的方法揭示出东北地区古文化与西北地区古文化的双向交流、相互作用的文化发展规律。

其二为《契丹族源传说借自回鹘论》。这是一篇东北古文化与西北古文化交流影响的论文，作者运用文化比较法，以及语言比较与文献比较的综合运用，论证了契丹族源神话传说借自回鹘文化这一前人未曾注意到的问题。此文在文化比较中旁及我国古族鲜卑、突厥的族源文化，指出“北方民族中有关‘天女’的传说是由来已久的”，从而为中华民族的“天女”族源文化（诸如殷商、高句丽、满族等）的研究开辟了新路。

对元代河南濮阳西夏遗民文化的研究，是《论稿》的一大成就。这里既有新史料的发掘，也有新学问的创建，在这方面，作

者付出的努力之大，是一眼便可看出的。作者对新近发现的《述善集》手抄本的研究，为元代西夏遗民文化的研究开辟了新天地。《〈述善集〉与元代西夏遗民研究》从整体上介绍了《述善集》的内容及其对濮阳西夏遗民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论稿》中收录的几篇研究《述善集》不同文献的专文都是应该引起重视的。《元代西夏遗民〈龙祠乡约〉探析》一文首先对《龙祠乡约》进行了校录、考证，并以之与北宋吕大钧制定的《吕氏乡约》和明末王阳明的《南赣乡约》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龙祠乡约》是以《吕氏乡约》为蓝本制成的，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了相当大的变更，在当时社会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南赣乡约》及清初《顺治上谕六条》的制定。这一研究勾画出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乡约史，并为中国伦理学史增添了新的内容，也为中国封建社会史，尤其是西夏史研究填补了新的内容。

《元代西夏遗民文献〈唐兀公碑〉校释》是对1983年于濮阳发现的《唐兀公碑》碑文的校录、研究。该碑立于元末，是研究元代西夏遗民的至为重要的资料。但由于自然的、人为的破坏，碑已不甚完整，文字脱落、字迹漫漶之处不少。有幸的是，碑文又可见于《述善集》卷3之中。本文以碑刻与《述善集》对校，基本上恢复了碑刻的原貌，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份可信从的《唐兀公碑》碑文，为研究《唐兀公碑》及元代西夏遗民文化提供了坚实的史料依据。

《〈祖遗契券志〉——元代西夏遗民整理家藏契券档案的记录》是作者从社会调查与新史料的发掘中对元代契券史进行研究。元代契约留存下来的为数甚少，现知者仅有福建晋江陈埭丁姓家谱所录元代买卖田宅的契书2组（共8件）、安徽省博物馆藏徽州祁门《郑氏眷契簿》所录元代地契13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至大元年（1308）徽州路祁门县在城税使司颁契

尾一件及敦煌研究院藏延祐三年永昌税使司文书一件。它们都被视为研究元代社会经济史的遗珍。而《述善集》所收《祖遗契券志》，则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惟一一件元代整理契券的记录，并且出自西夏遗民之手，再现了他们高度的汉文化水平，故显得弥足珍贵。

《元政府护持学校文告二件——元代西夏遗民兴学档案之一》对《述善集》所收元政府中书礼部于至正十八年（1358）向濮阳西夏遗民所建崇义书院颁布的两份护持学校文告《锡号崇义书院中书礼部符文》与《中书礼部护持学校文榜》进行了校录研究，从二文告可以看出，元政府对儒学教育是相当重视的，在各级政府部门都设有专门的管理、督促儒学发展的机构，极大地促进了元代书院（庙学）的发展。可以说，这二件文告是元代教育史及其史料的新发现，“为我们认识元代书院的赐名制度及元政府对教育的重视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接下来的《崇义书院史料辑注——元代西夏遗民兴学档案之二》则具体研究了元代濮阳西夏遗民创办崇义书院的始末。该书规模较大，在元代书院史上颇有些地位，但由于文献缺载而少为世人所知，有幸的是，《述善集》收录有许多与崇义书院有关的资料，其中以《濮阳县孝义乡重建书院疏》、《崇义书院记》、《有元澶渊官人创建庙学记》、《崇义书院田记》等文献的记载最为集中，把唐兀氏三代兴建书院的起因、经过以及学堂面积、学田大小、教学内容等都一一记录在案，像这样完备的元代书院档案是不多见的。该文对这些文献进行了细致研究，对研究元代书院不无参考价值。

《论稿》第四组包括论文6篇，其中，《怯卢文书所见鄯善国之货币——兼论与回鹘货币之关系》一文探讨了西域货币史具有重要地位但研究难度相当大的鄯善国货币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汉文史籍少有记载，而内容丰富的原始文献又都是用怯卢文写成

的。这些文献于新疆发现后，虽大部分已由西方学者研究刊布，但若无梵语知识及其相关新疆古代民族语言知识，仍难以进行细致的研究。富学君以其梵语、回鹘语及英语兼通的优势，经过对有关史料的认真研磨，基本上弄清了鄯善国货币的概貌，尤其是文中将佉卢文书中的 muli（借自梵语的 mūlya）与维吾尔族历史上著名的普尔（pul）钱联系起来，对阐明普尔钱的来源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颇值得关注。

《元代哈刺鲁人伯颜宗道新史料》一文，是对《述善集》附录中所见《伯颜宗道传》及伯颜宗道所撰《节妇序》、《龙祠乡社义约赞》的校录与研究。其它如《古代柯尔克孜人的宗教信仰》、《敦煌本突厥文 Īrq 书跋》、《古代突厥文〈台斯碑〉译释》等都是新涌现出来的文字、考古史料来解决学术问题的有益尝试。兹不一一赘述。

新学问来自新史料，这是《论稿》的一大学术特色。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给我国学术界带来了敦煌学、吐鲁番学、回鹘学等一系列新学问，也为藏学、突厥学、西夏学、蒙古学的研究输入了新鲜的血液，也带来了东北地区与西北地区古文化交流方面的新史料与新学问。《论稿》以新发现的史料，比较扎实地论述并解决了不少这方面的问题，为中国北方民族历史化学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富学是我学术上的忘年交，主攻维吾尔族历史文化与敦煌吐鲁番学，先后出版过《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回鹘之佛教》、《西域敦煌宗教论稿》、《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一辑）、《庄浪石窟》、《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研究》等多部专著，在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但他并不以旧有的学术领域为囿，而是不断开拓，努力进取，将自己的学术视野开裹到非常广阔的领域，这从《论稿》所涉范围之广即可窥其一斑。他乐于助人，在学术研究，尤其涉及西北地区民族历史文化方面，对我多有帮助。《论稿》

结集，嘱我代序，这是我学习的好机会。《论稿》的每一篇文章对我都是新问题，均可从中学到东西，可谓先睹为快，获益匪浅。从《论稿》新史料、新观点、新成果、新信息中可见富学的学力功底以及深湛的古代中外语言文字学功底，这是我所钦佩的。相信《论稿》的出版定会对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有所推动，并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关心这个领域。是为序。

张碧波

2001.1.21 于哈尔滨

目 录

序一	孙进己 (1)
序二	张碧波 (1)
敦煌与吐蕃、回鹘、蒙古学研究	(1)
回鹘佛教对北方诸族的影响	(12)
也谈 SARIγ BAŠ 的名与义	(24)
“黑龙江”名出阿尔泰语考	(33)
蒙古统治与元代畏兀儿社会	(38)
回鹘文献所见蒙古“合罕”称号之使用范围	(54)
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见吐蕃回鹘文化关系	(60)
吐蕃对敦煌的统治：百年研究述评	(75)
从二十八宿看唐宋时代吐鲁番之文化杂糅	(92)
龙：联结中华诸族与中印文化关系的纽带	(98)
论辽朝的西域经略	(110)
辽鎏金双龙银冠之佛学旨趣 ——兼论辽与敦煌之历史文化关系	(119)
契丹媵婚制考略	(131)
契丹族源传说借自回鹘论	(144)
《述善集》与元代西夏遗民研究	(156)
元代西夏遗民《龙祠乡约》探析	(162)
元代西夏遗民文献《唐兀公碑》校释	(176)
《祖遗契券志》	